
人之再造：土改运动中的身体政治

——基于川西北地区的考察

崔一楠¹ 陶利江²

(1. 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绵阳 62101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732)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改运动给川西北乡村社会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在中国共产党传递意识形态的过程中，身体政治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凭借身体之伤的展现与诠释，中国共产党以“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的方式让农民认识到了苦难的根源。对地主身体的规训、惩罚昭示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也凸显了农民强烈的复仇意识，政治对身体的分类操控加速了乡村社会的整合及认知模式的更迭。革命视域下的身体被赋予了不同以往的象征意义，生理感知、审美取向、身体归属、形象表达等都与阶级政治密切相关。土改运动是身体的革命，同时它也塑造了革命的身体，身体与革命两者交织互动，共同书写了中国乡村的历史。

【关键词】乡村社会；川西北地区；土地改革；身体政治；乡村社会；政治动员；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C912/D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41(2016)06-0033-06

20 世纪50 年初的土地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进行的一次运动式治理实践，这场运动重塑了乡村社会的结构与秩序，为执政党地位的巩固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近年来，随着新思维、新理论的出现以及各学科间的交汇融合，学界关于土改运动的研究呈现出视野转向、范式创新的趋势^[1]。与此同时，得益于地方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学者们逐渐从宏大叙事和“注解”式的研究中脱离出来，主张通过具体的实践过程来探究土改运动的真实面目，这也推动了相关问题的再认识。就现有的研究情况看，专门以身体为视角来透视土改运动的成果尚不多见，对革命实践中身体政治的考察亟待丰富。将身体引入革命史研究，可以拓展现有的研究视域，让革命的理想与现实、矛盾与冲突具体而生动地显露出来，使我们对革命和身体的交错互动关系有更为清楚、新颖的认识。有鉴于此，本文乃以川西北地区为个案，尝试经由身体政治来诠释革命历史，经由革命历史来体察身体政治，希冀此种思考能够发挥见微知著之效，从而深化学界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土改运动的理解和认识，也为方兴未艾的身体史和新政治史研究贡献一得之见。

收稿日期：2016-05-10

作者简介：崔一楠，历史学博士，西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西南地区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1950 - 1957)”(13CDJ005)，项目负责人：杨丽梅。

一、伦理与政治：身体承载的双重意义

20 世纪50 年代初，随着土改运动在西南地区全面开展，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最大政治心理工程就是将“阶级”、“剥削”、“革命”等原本陌生的政治概念迅速而明确地传递给农民，使其理解、运用，从而建立起符合意识形态需要的社会认知框架。不过，就四川这样的新解放区而言，农民对阶级理论的理解并非心领神会，水到渠成。川西北部分村落历史上虽经历过轰轰烈烈的苏维埃运动，但无论在农民的思想觉悟上，还是在乡村组织化程度上，均无法与北方老解放区相比。加之阶级话语与传统观念之间存在明显张力，农民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根植于乡村社会特有的文化脉络，他们倾向以传统伦理观念去构造他们的利益和期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看待自己和地主层级地位的评价标准^[2]。换言之，生活在“熟人社会”差序格局之中的农民从未意识到自己与地主的阶级分界，而只有贫与富的经济差别，尽管生活穷苦而艰辛，但他们没有强烈的革命意愿，不会轻易萌生反体制的念头。

要动员农民投身土改运动，达到重构乡村社会的目的，仅有简单的政策宣讲和阶级斗争宣传是不够的。土改动员的关键是要让农民不断挖掘身体苦感，利用多种形式的诉苦来点燃革命的“燎原”之火。有学者就曾指出：“诉苦的成功就在于将农民的生活苦难落实到身体和精神的真实体验中，农民对自己的感知更多地来自于身体，而不是经过反思的思想，更不是一个可以述说或者需要述说的东西。”^[3]有了身体这个纽带，抽象的阶级苦就变成了日常生活中可以感知的“恩怨”与“仇恨”，农民围绕身体之伤的言说，既可以实现情感的宣泄、传导，又能使他们更真切、直观地感受到今昔的强烈反差，强化“翻身”之感。因此，土改运动中的诉苦极具身体意味，口头和肢体上的身体实践不仅成为财富分配和权力重组的关键要素，还是农民从传统伦理出发，经过政治动员，最终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媒介和载体。

在诉苦会上，身体政治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农民的苦难记忆无一不与身体紧密相关，而地主对农民的肉体摧残则构成了其道德上的劣根性和政治上的反动性。身体如同一面镜子，映射出农民的悲惨遭遇和地主的累累罪行，例如有妇女讲述自己的丈夫被地主喊去守夜，过了好几天都没回家，后来邻居在水塘里发现了尸体，“脖子被勒得手指都放得进去，腿上还有两个洞”^[4]。为了逼迫农民交租，地主指使狗腿子将老实本分的庄稼汉打得头破血流，弄得好好的一户人家妻离子散，卖儿卖女。长工偶然撞见地主的女人与别人通奸，地主不但要杀人灭口，还要毁尸灭迹，连入土为安的机会都不给留下^[5]。被无意冒犯时，地主竟骑在农民身上毒打，还用剪刀扎，直到血肉模糊方才罢手^[6]。种种施加于身体的罪恶会迅速激起怒火与仇恨。与此同时，讲述者“声泪俱下，悲伤过度，昏倒在地”^[7]的场景更让农民感受到一种切肤之痛。当触目恻心的身体叙事在群体中得到呼应，建立起一个善与恶截然对立的氛围时，受难的个人便会得到集体意志的支撑。仇恨之火在群情激奋的会场里蔓延，农民挥舞着拳头，开始大声咒骂：“地主龟儿，从来没有把咱们当人看！”“抓狗日的来问话，非打得他不歪为止。”更有农民直接跑到主席台上呼喊：“今天这么多人来开会，天下农民成了一家人，以前个人的仇跟大家诉不着，如今有仇的大家给伸冤，你的仇就是我的仇，咱们现在就去找地主算账！”^[8]

身体受难成为民间伦理与政治伦理对接的桥梁，是农民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基础。在血肉之痛的表达中，与阶级认知无关的要素被屏蔽，地主不仅沦为阶级斗争的敌人，同时也是民间伦理秩序的天敌，他们对身体的剥蚀不仅伤害了农民，还严重背离了温情脉脉、宁静祥和的乡村理想。作为反社会的旧势力，地主在明确政治身份之前就已经成为民间伦理秩序的天敌。民间伦理与政治伦理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体现在这里：只有民间伦理宣判的恶才是政治上的恶，只有这个伦理的破坏者才同时成为政治上的敌人，只有维护这个伦理的力量才有政治上的合法性^[9]。血腥的身体暴力一方面让地主成了“政治野兽”，另一方面也给土改提供了经济、政治以外的道德支持。在身体意义的建构中，政治被道德化，道德也被政治化，阶级觉悟通过身体觉醒表现出来。

除了常规形式的诉苦会，川西北地区还积极利用公祭来唤起农民的身体感受。公祭仪式在干部的精心布置下“显得至为庄重”，农民手托灵位、披麻戴孝，道路两旁挂满了标语和死难者的画像，为了让农民有身临其境之感，地主杀害农民的工具被摆放在显要位置^[10]。一系列关于肉体消亡的讲述形成了撬动农民情感的“口头代码”，在多种场景因素的烘托下，又衍生出易于感知的“视听代码”，最终这两种代码被归纳为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万方数据语义代码”。公祭过程中的身体意义书写不

仅涉及外部环境的营造和情感的宣泄，它还连接着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民间伦理。在中国传统社会，“身体伤害——血债复仇”不仅是各类小说、戏剧的叙事母题，还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势和心理情结，一个人若有夺妻之恨、杀父之仇，那其身体就应当成为复仇的武器。实际上，不同地域、不同种族对复仇的态度大体相似。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指出了“易洛魁人所绝对承认的血族复仇的义务”^[11]。儒家学说对符合道德原则的身体复仇持肯定态度。孔子主张在面对“血仇”时，应“寝苫，枕干，不仕，弗与共天下也”。《孟子·尽心下》亦有：“杀人父者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者人亦杀其兄”之语。遇到亲人身死体残而理当复仇，这种民间伦理为中国共产党传递意识形态提供了情感动力，身体复仇实现了“阶级仇”和“家族恨”的彼此蕴含，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互相说明，既让阶级性和革命性在传统伦理中孕育而出，又让抽象的政治概念实现了生活化和具体化，成为农民易于接受的普化经验。当农民意识到“复仇”不只针对某个地主而是抽象的“地主阶级”时，他们才真正完成了从生理性身体复仇到制度性政治复仇的革命动员之旅。

二、规训与惩罚：身体操控中的权力展示

土改运动中的身体政治涉及身体的分类、处理、阐释及评价，这一系列的操控使得身体不再只是个人范畴的私密物，而是公共视域下的象征体，承载着传统与革命、历史与现实等多重意义。尼采曾指出：“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只能是身体的历史，历史将它的痕迹纷纷地铭写在身体上。”^[12]福柯亦认为：“身体是事件被铭写的表面(语言对事件进行追记，思想对事件进行解散)，是自我被拆解的处所(自我具备一种物质整体性幻觉)，是一个永远在风化瓦解的器具。”^[13]正是在此基础上福柯开辟出了个体向度的微观权力学及群体向度的生物政治学。

土改运动改写了乡村的历史，在对旧秩序的颠覆中，身体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对象，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展现着福柯所谓的“权力力学”。被权力形塑的身体成为政治动员技术得以发挥作用的肯綮，作为新社会的“异类”，地主的身體被视为罪恶的符号。在川西北各县召开的公审大会上，地主被捆绑着站在或跪在农民面前，接受农民的质问、谴责和国家的审判、惩罚。地主必须做出与身份、场景一致的行为，如低头认罪、目光呆滞，有时还会痛哭流涕，浑身发抖，如若不然，将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对待。凭借连续性规训技术(控制身体的位置、行动)和稳定性规训技术^①(实现身体与特定政治身份同质化)的应用，中国共产党塑造了“听话”的身体，让农民体察到一种在旧势力象征资本崩溃基础上建立的新的国家权威。

对地主的规训和惩罚并非由新政权独自完成，中国共产党需要将部分权力配置给农民，实现从“政治独白”到“政治共识”的过渡。公审会上，农民一个接一个痛斥地主的恶行，有妇女指着地主的脑袋，历数其对自己的殴打、辱骂，为了活命自己曾给地主磕了几十个头，到头来还是被逼得差点饿死，说到激动之处，她还抽了地主好几个耳光，“周围的农民也冲上来踢了杨益林几脚，喊着炮打脑壳”^[14]。肢体行为和言语宣泄使农民以最直接的方式体会到了政治地位的转变，在规训、惩罚中迅速找到了翻身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经斗争大会所营造的强烈剧场效应发酵，便会转化为底层群体的集体性情感表达——向昔日村庄优势权力与文化秩序挑战^[15]。“老子今天不要金银，就是要骑在地主龟儿背上威风一下”。平日里“腰杆子弯”的农民也“挺起了胸膛”，他们抓着地主的衣领，指着毛主席的画像说：“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的靠山，你不认罪硬不行!”^[8]对地主身体的操控极大地增加了农民的象征资本，在分配斗争果实时，地主那些无法确切统计的财产也被身体化，激烈的身体斗争成为农民追缴“浮财”的普遍做法。

面对身体上的复仇，曾有土改工作团干部认为农民在“蛮干”，认为“人总是人，都有感情，这样打会引发群众同情地主”。农民对此类言论反映强烈，主张这是“立场不稳”和“要犯错误”的表现。干部最终也不得不顺应农民的要求，承认“在情感上与大家有距离，不自觉地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无意识地同情了地主”。下一次再看到农民惩罚地主时，干部“心里也觉得痛快，不认为这是违反政策了”^[16]。阶级话语牢固确立了农民对地主身体的支配权，他们不仅获得了“仪式上的优越

¹ ① 无论在何种形态的社会中，政治仪式都要依靠两种最为基本的规训技术处理身体：一种是控制身体和行动的连续性规训技术，另一种是维系身体和身份同质化的稳定性规训技术。参见王海洲：《后现代身体的分裂与聚合——基于政治仪式中身体规训技术的分析》，载《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感”，还以策略性的应对来回应政治权力的介入，从而使仪式朝着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集体性的情感爆发有时会带来“左”的偏差，农民在火热的革命氛围中会丧失理智，例如在绵阳县青义乡，农民用“喂蚊子”、“顶砖头”、“熏烟火”的方式来惩罚地主。新市乡一次抓捕抗拒赔偿判罚的“恶霸地主”十余人，农民高喊口号，要求全部处决，其中有多人被立即执行^[17]。对于国家政权来说，如何处理“左”倾问题实在是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身体惩罚中“左”倾的负面影响颇为严重，决不能听之任之；另一方面，如果不对地主进行严厉的身体惩罚，很多村庄无法开展“高强度内斗争”，禁止暴力，不允许杀人，农民就会有顾虑，不敢起来斗争，撕破脸的效应无法达成，革命政权会陷入更不利的局面^[18]。为此，先放手再纠偏成为川西北地区土改运动的常态。此举既达到了动员的目的，满足了农民改善生活的要求，又尽量减轻了“左”倾的负面影响，维护了新政权的正面形象。

对地主身体的规训与惩罚不仅来自于国家和农民，也来自于地主家属。川西北各县、乡不定期组织召开地主家属会，在“消除顾虑、分化瓦解、团结多数、打击少数”原则的指导下，“家属会”成为展示土改运动合理性与公平性的渠道。“我爹这个恶霸地主不晓得害死了多少人，政府镇压对的很。”“我丈夫是地主，他霸占别人的老婆，害死人家丈夫，干尽了坏事，应该炮打脑壳，我要好好生产，跟共产党走。”^[19]此类表述比比皆是，无需一一列举，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家属对于地主身体的厌恶，尽管这些说辞并非一定出自真心，但却凸显了权力的规训力。土改运动在农村形成了一个“高压力场域”，在这样的场域中，基层干部掌握着鉴别政治态度，划分敌我阵营的权力，凡是有悖于中国共产党主流话语体系的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打击对象。地主家属若想不受到牵连，就必须成为仪式中的“理性人”，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他们无法置身事外，只能主动迎合，任何替地主的辩解、开脱以及对政府和农民的埋怨都是危险的。地主家属及其在场围观的所有民众都必须懂得这样一种逻辑：随着土改运动的深入，政治伦理开始取代血缘宗法成为主导人们生活的行为规范，任何有悖于此的身体都将不再是负载生命的鲜活个体，而是需要监视、禁锢乃至消灭的象征体，等待他们的不仅有肉体上的惩罚，还有家庭的遗弃。

三、认同与感恩：身体意义的重新构建

土改运动使生活在社会底层、政治上毫无地位可言的贫雇农，一夜之间成了乡村的主人，昔日被蹂躏的血肉之躯在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完成了解放，甚至身体上的疾病和残缺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清除。乡村权力秩序的重建和生产资料的再分配发挥了“治疗术”的作用，农民的身体状态在革命文化的场域中日益政治化。例如在彰明县，解放前曾有农民被地主欺压得整天生闷气，患上了咳嗽病。斗争地主后，原来的病好了，弓着的背也挺直了，他见到工作团的干部比见到亲人还亲^[20]。罗江县宝林乡分了土地后，跛脚的大娘走路也不再用人扶，有时还会走上十几里路去参加斗争大会。旧社会体弱多病的贫农在土改中像是换了个人，身上有了力气，做活路也积极多了，他说是共产党治好了他的病^[21]。经历了土改运动的洗礼，农民的身体成为论证新政权合法性的重要表征，生理机能的恢复无疑让翻身的感觉更加生动、真切。与此同时，农民也在用自己的身体实践来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认同。为了防止地主“贼心不死，背后搞阴谋”，有的农民躲在房前屋后日夜监视地主，甚至晚上还藏到床下听地主和家人说话^[22]。金堂县的一些农民积极响应土改工作团的号召，每天走家串户作动员，“深夜了，十五村雇农张青云穿两件单衣还在领导小组开会，检查工作，有群众问他为啥不怕冷不怕饿，他回答说：‘万方数据办自己的翻身事情谁怕冷，饿、冷都是地主给的，要不饿不冷，就要打垮地主，才能有吃有穿。’”^[22]“冷”与“饿”的生理感知具有了阶级性，农民开始主动把身体与革命相联系，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透过身体感受逐渐走进了农民的内心世界，成为其日常生活中内化于心、外显于行的自觉反映。

身体的美与丑在土改运动中也发生了逆转，审美上的评判具有了身体政治的浓厚意味。在传统的乡村社会，身体生理意义上的美丑也是社会意义上的美丑^[23]。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体系中，“劳动光荣、剥削可耻”的逻辑让从事农业生产成为乡村社会判断身体美丑的唯一依据，农民手上的老茧、脸上的皱纹、皮肤的黝黑都成为美的象征，而地主白皙的肤色、富态的体型则都成为丑的体现，是身体罪恶的证明。乡村中美与丑的新认识一经提出便很快成为农民普遍接受的标准，他们会讥讽地主说：“敢不敢跟我比一比，看看谁脚上的茧厚，谁的肩膀黑”，“老子手上的伤疤比你们一家子加起来都多，不信给你龟儿看看”^[24]。因长期从事体力劳动而留下的印记给了农民前所未有的自豪感，旧的审美观被彻底颠覆，生理的美丑由政治的善恶所决定。

利用多种类型的表彰会来操演身体政治也是川西北各地普遍采取的做法。在梓潼县召开的一次土改模范表彰会上，土改工作团干部给每位先进代表带上大红花，伴随着周围农民的掌声和欢呼声，代表们向毛主席的画像连连鞠躬。雇农曾顺海跟在场的农民讲，他给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取名“得田”，并认为这个孩子不是老天爷给的，是共产党给的。妇女代表王荣秀也激动地表示：“我要跟娃儿说是毛主席救了我们一家，以后他就是共产党的人。”^[25]农民对国家政权的感激显示出身体“国家化”的趋势，生理身体有了政治上的归属，从受之于父母到为政党、国家所有。从表面上看，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身体的个体化，他们不必再忍受地主、宗族和旧官僚的意志，但这并未完成身体意义构建的最终使命，国家“在场”的情境让身体的价值有了进一步升华，农民利用“以身相许”的言说方式不但表达了个人情感和政治态度，还树立起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类血缘”关系。作为一个兼具革命性与现代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把农民的身体从落后的小范围组织中解放出来，置之于国权的保护之下，此种变革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在构建农民身体意义的过程中，妇女是一个颇为重要的群体。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川西北乡村妇女普遍保守、封闭，她们只能依靠自己的丈夫、家庭生活，“安分守己”、“相夫教子”的思想根深蒂固。为了打破此种局面，促进妇女的政治化和社会化，川西北地区采取了“男女平等，同样分田，一起动员”的政策，终结了“娘家有九十九间楼，姑娘分不到一根椽子头”^[26]的时代。此外，各区、县有意识地选拔一批农村妇女担任政府委员、乡长、村主任、农会委员等职务，让她们在土改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随着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获得，女性的身体形象日益男性化，“男人能做的活路女人也能做”成为乡村主流舆论。政治视域下的妇女有了男性的权力和特征，原有的“弱者”形象被斗志昂扬的“强者”姿态取代。

除了妇女之外，儿童的身体意义也在土改运动中被重新诠释，他们跟成年人一起参加诉苦会、公审会。在会场上，他们高喊着口号，对地主的身体施加规训和惩罚，有些孩子还作为“翻身儿童”登台发言^[27]，表现出不亚于成年人的阶级仇恨和革命热情。儿童的一言一行深受政治因素的渗透和影响，潜移默化地进行着身体及观念的政治化，这对于儿童的成长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身心体验可能会伴随其一生，成为挥之不散的永恒记忆。

四、结 语

从动员民众到斗争地主，从仪式操演到日常生活，身体实践贯穿于土改运动的全过程。作为民主革命的核心要素，身体是农民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桥梁和媒介，过往的苦难记忆必须经由血肉之痛的感知后才会被唤起。在身体之伤的阐释中，中国共产党将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融合，借助情感力量强化了两种话语体系之间的循环关系。今昔身体感受上的强烈对比释放出了历史为现实服务的功能，使农民直观而真切地感受到中国共万方数据产党的解放者形象，也生产出了国家的合法性及对民众的动员能力。

作为乡村社会的“他者”，地主经受了来自多方面的规训与惩罚。凭借连续性规训技术和稳定性规训技术的应用，中国共产党利用“听话”的身体传递出国家的立场和态度，农民也在革命文化的场域中利用身体力量来宣泄情感、表达主张、获取利益。强大的政治压力令传统的血缘认同让位于革命认知和政治情感，对地主身体的鄙弃和贬抑不仅是社会共识也成为家庭共识。土改运动开启了身体政治的滥觞，阶级理论对身体进行了分类处理，地主身体不再属于其个人，一旦有了政治需要便要出场展示。身体斗争不单纯是对过去行为的惩罚，更有指向未来的意义，它为亲历其中者创造了新的行为规范，以便使其明白如何在社会主义政治下把握身体^{[1]13}。

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的身体，也催生了身体感知的政治化，一系列人体机能的恢复、好转和生理感受的获得都与政治密切相关。乡村社会中原有的审美观念被颠覆，在阶级政治的语境下，审美被政治化，政治也被审美化，两者共生互动，合力塑造着农民的精神世界。农民对国家政权的感激、认同透露出身体国家化的味道，而乡村妇女身体形象的男性化和儿童身体形象的成人化，则显示出革命的身体已成为中国身体的常态模样。土改运动的落幕并未预示着身体政治的终结，围绕着身体进行的意义构建和动员技术发明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身体政治既是革命的“老朋友”，又是权力的“新宠儿”。

参考文献:

- [1] 满永. 革命历史与身体政治——迈向实践的中共历史研究[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6(1): 4-14.
- [2] 崔一楠, 杨芳慧. “植入”阶级: 土改运动中的记忆构建与仪式操演[J]. 江苏社会科学, 2016(2): 207-213.
- [3] 程秀英. 诉苦、认同与社会重构——对“忆苦思甜”的一项心态史研究[D]. 北京: 北京大学, 1999: 14.
- [4] 中共绵阳地委. 土改问题报告[Z]. 绵阳市档案馆, 69-12-1.
- [5] 绵阳土改工作团. 绵阳县石马乡为死难农民报仇雪恨追悼大会简介[Z]. 绵阳市档案馆, 69-12-9.
- [6] 绵阳土改分团. 关于六个乡召开追悼复仇大会总结报告[Z]. 绵阳市档案馆, 69-12-9.
- [7] 安县土改工作分团部. 安县镇压反革命工作报告[Z]. 四川省档案馆, 建西-1-81.
- [8] 绵阳土改工作团. 关于土改中发动群众问题的检查报告[Z]. 绵阳市档案馆, 69-12-10.
- [9] 崔一楠, 赵洋. 叠加的镜像: 土改多质性的微观审视[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1): 53-58.
- [10] 绵阳土改工作团. 关于绵阳云凤乡、柏林乡土改工作情况的通报[Z]. 绵阳市档案馆, 69-12-10.
-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98.
- [12] 汪民安. 身体、空间和后现代[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18.
- [13] MICHEL Foucault: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148.
- [14] 绵阳土改工作团. 绵阳石马乡土改镇反斗争大会总结报告[Z]. 绵阳市档案馆, 69-12-19.
- [15] 吴毅, 陈欣. “说话”的可能性——对土改“诉苦”的再反思[J]. 社会学研究, 2012(6): 146-171, 244-245.
- [16] 绵阳土改工作团第二分团. 第二分团参加绵阳石马乡土改工作组工作总结[Z]. 绵阳市档案馆, 69-12-2.
- [17] 绵阳土改工作团. 关于土改乡工作检查综合报告[Z]. 绵阳市档案馆, 69-12-7.
- [18] 廉如鉴. 土改时期的“左”倾现象何以发生[J]. 开放时代, 2015(5): 150-161, 9.
- [19] 梓潼县土改工作分团. 关于召开家属会的报告[Z]. 绵阳市档案馆, 69-12-19.
- [20] 中共彰明县委. 关于土地改革的总结报告[Z]. 绵阳市档案馆, 69-12-10.
- [21] 罗江县土改分团部. 关于罗江土改工作中发动群众的检查向区党委报告[Z]. 绵阳市档案馆, 69-12-8.

-
- [22] 绵竹县土改分团. 复兴乡两个村子发动群众的检查[Z]. 绵阳市档案馆, 69-12-10.
- [23] 金堂县土改分团. 金堂祥福乡关于发动群众的检查报告[Z]. 绵阳市档案馆, 69-12-2.
- [24] 杨豪. 传统的发明: 翻身运动中的仪式与身体——以冀中解放区为中心[J].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3(2): 23-27.
- [25] 安县土改工作分团. 关于培养积极分子工作简介报告[Z]. 绵阳市档案馆, 69-12-11.
- [26] 绵阳土改工作团. 土改中如何发动妇女[Z]. 绵阳市档案馆, 69-12-2.
- [27] 罗江县土改分团. 土改第一阶段总结报告[Z]. 绵阳市档案馆, 69-12-9.